



东子 著

应
试之外
别样
路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我的快乐教育理念与实践 YINGSHIZHIWAI BIEYANGLU



应试之外别样路

我的快乐教育理念与实践

东子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应试之外别样路

我的快乐教育理念与实践

东 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227千字

2006年11月第一版 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204-08725-9/G·2343 定价:23.00元

电话:(0471)4971659(总编室) 4972052(发行部)

邮编:010010 电子邮件:dzbjs@163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图书,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!



目 录

第一章 父亲的成长历程

- 童年逸事..... (1)
- 军营自学 (29)
- 古都求学 (46)
- 还在成长 (72)

第二章 女儿的成长之路

- 女儿成长全记录 (97)
- 女儿成长手记..... (103)

第三章 东子教育论述

- 教育随笔..... (183)
- 教育演讲..... (225)



第一章



父亲的成长历程



童年逸事

东子童年的成长过程，也是一个挨打的过程。脾气暴躁的父亲秉承“棍棒教育”，只要不听他的话，只要做了他认为错的事，那就要挨打。父亲的打骂没有把东子驯化成乖顺的孩子，相反他成了倔强、叛逆的孩子。因不认错而辍学种地，又为逃避种田，几次离家出走，一度成为“问题少年”……

△ 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

2005年春节，坐在家中的火炕上，围着火盆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……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那一年初春，母亲怀上了第八个孩子（此前的七个全是男孩，其中有两个已经夭折）。虽然日子很艰辛，但怀上这个孩子，母亲还是很高兴，因为又有要一个闺女的盼头了。母亲还特意找人算卦，算卦人十分肯定地说，这次保证是女孩。

农历十月十二日，我出生了。当接生婆告诉母亲又是一个带



“把”的时，母亲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亲友都劝母亲：“信命吧，你就是没有女儿的命。”这一次母亲真的信命了，连算命先生的卦也不准了，还能信啥。为了表示不再生了，母亲给我取名“东(音)子”，不知是谁说的，叫“东子”就不会再生了。此前村中确实有邹老东子、徐老东子、薛老东子，皆为家中老么。如果不是三年后弟弟又来到了人世，我就应该叫“范老东子”了。弟弟的到来，剥夺了我做老么的权利，也只好把“老”字去掉，叫“范东子”了。

我父亲的悟性很好，自幼天资聪颖，以至于走出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。解放初期的中国农村大多数人是文盲，读两年书的父亲由于识文断字，当上了生产队会计。在此后三十多年的会计生涯中，由于工作认真，多次受到表彰奖励，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尊重。父亲性情暴躁，心直口快，为人正直，而且家规甚严，要求我们做到的，他都能先做到。

小时候，常听父亲讲，劳动最光荣。每年春天，放学后我和四哥、五哥都要到田地里打茬子；夏天要到地里挖野菜，到草地放羊放猪；秋天，要拾庄稼拣柴火；冬天，要积肥拾粪。

由于父亲脾气不好，我们从小没少挨他的打，我都18岁了，在参军走前还被父亲踢过。就是母亲也时常要忍受父亲的暴力。尽管每次打过母亲和我们，父亲总有懊悔之情，但是本性难改，脾气一上来，谁也拦不住他。但是，虽说父亲的脾气不好，可他在屯子里的人缘和威望非常高。在村民的眼里，掌管那么大一个农场的财政，是了不得的人；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耿直的性格，熟识父亲的人都说他“嘴黑”，说话太直性，不给人留面子，可谁家有了什么事，还是都来找父亲。因为父亲评判事情黑是黑，白是白，从不看人下菜碟，哪怕是天王老子做错了事，他也敢说敢骂。

1946年春，比父亲小一岁的母亲走进了范家门。

母亲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富商，不惜重金供子女读书，终于将母亲的舅舅供到了京城上大学。方圆百里皆知，扶余有个迟大先生，谁



家打个官司告个状的,请他写状子递上去准赢。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,连我外婆都读了六年书,但由于家道中落,我母亲竟一天书也没读。

母亲不仅貌美,而且还有很多美德。因为她善良,所以人们都说,范三老太太心眼最好。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,每有乞讨的从门口走过,母亲总是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米饭端给他们。因为母亲勤劳,使得我们七兄弟有吃有穿没光着露着。记得小的时候,每天晚上闭上眼睛之前看到的是母亲飞针走线的身影,而早晨睁开眼,看到的是母亲在灶台旁忙碌的身影。于是,很长时间里,我认为母亲是不睡觉的。因为母亲淳朴,赢得了村人的爱戴与尊敬。又因为母亲的谦让,多年来容忍着父亲的暴躁,和父亲相携走到了白头……

善良的母亲就是踩死一只蚂蚁都要念叨一句“阿弥陀佛”,可面对我们几个淘气的儿子,母亲常常表现出少有的“狠”。记忆中有很多次,母亲把我堵在墙角,用笤帚狠劲抽打,无论我怎样喊叫、求饶,但母亲就是不停手,直到打得笤帚散开了花才罢手。母亲表现出来的“狠”让我觉得母亲很陌生,挨打的时候就在心里想:肯定是后妈。

母亲不识字,所以经常受不识字的苦,比如我们给她写信,都是父亲或侄子念给她听。如果她想给我们写信,也只好由别人代笔她口述。由于不识字,母亲还闹出一些笑话。农村文化生活单调一些,没电视的时候,天一黑,就睡觉了。自从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,父母睡觉前一定要看一会儿电视。父亲向来关心政治,所以《新闻联播》和《焦点访谈》是必看的节目。母亲从不关心政治,对《新闻联播》毫无兴趣,但对《焦点访谈》却情有独钟。用母亲的话说,净唠实在嗑。有时母亲来了兴致,就会对乡亲讲访谈的事。别人问她从哪儿听说这些事情的,母亲就指着电视说:“是电视上的那个‘焦点反弹(访谈)’说的。”

开篇之所以先从我的父母说起,因为是他们塑造了我,给予我一个别样的生命和灵魂,才有了后面我所要讲述的别样人生……



△ 想当毛主席

出生在那样一个特别的年代,我最先关注的人物自然是毛泽东!

很实际地说,我自小就对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,曾不止一次猜测我的名字与毛泽东有关,因为我出生那年正是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第一年,那年出生的孩子起名大多都有个“东”字,什么“卫东”、“向东”俯拾皆是。而当时的战士则以“毛主席的好战士”、学生以“毛主席的好学生”自誉,就连懵懂的孩童也没忘了说一句“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。”如此推论,“东子”理当是“毛泽东的孩子”之意了。

最初“结识”毛泽东是在画上。在生产队的墙壁上高高悬挂着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画像,前几个胡子拉碴的,只有毛泽东让我看着“顺眼”,每次抬头端量这几个人时,我总是将目光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。

小时候与伙伴做游戏时,我时常扮演指挥官。每当见到我挥着根棍子像挥着旗子的威风样子,母亲就说这孩子心大着呢,总想当毛主席。在母亲的眼里,“毛主席”就是中国最高的职位。父母每提起“毛主席”几个字,语气中满是景仰和爱戴,脸上也溢满了凝重和严肃的表情。受父母的影响,“毛主席”在我幼小的心里,就是一尊神,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所无法企及的神。

很实际地说,像我这个年龄的人,对毛泽东有如此深厚感情的是少之又少,因为在我出生后的十年里,也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十年,是他辉煌革命生涯中相对黯淡的十年。尽管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中,处处灌输的是“毛主席万岁”、“伟大领袖毛主席”等思想,但大多数人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,而逐渐淡漠了对毛泽东的情感。而我小时候对毛泽东是一种懵懂的敬畏,大了之后则更多的是景仰和折服。

那个年代的人们把毛泽东当作神,小小年纪的我自然也不例外。所以1976年秋季的一天,当我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,我是不相信



的。因为神是永生的，毛泽东既然是神，就永远不会死。大家不也是整天喊“毛主席万岁”吗？他不是还没活到一万岁吗？直到参加学校组织的追悼会，我才不得不相信他真的和普通人一样死了。年幼的我心里多出了很多困惑，可是人们都沉浸在悲痛中，没有人理会一个少年的心情。

接受了毛泽东逝去的现实，不懂得悲伤的我，心里生出了惶恐：大家都说毛泽东是太阳，我们天天在唱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、“万物生长靠太阳，雨露滋润禾苗壮……”如今毛泽东不在了，太阳还能升起来吗？禾苗还能生长吗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，翌日，我早早爬起来，一个人跑到村头，站在小山坡上仰望东方。让我不解的是太阳竟和往日没什么两样地冲出了云霄，将阳光慷慨地洒在了我的身上。惶恐没有了，继而又有些失落。于是我又把注意力放在生产队那一片菜地里，接连几天里，我天天跑到菜地里看那些青菜，我没有看到一棵秧苗打蔫的，它们越长越茂盛健壮。我终于确定，除了人们脸上悲痛的表情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。我的忧虑总算消除了，但同时加重了内心的失落。

后来长大了，闯荡世界了，但我从未停止过和毛泽东的“亲密接触”，在我阅读的书刊中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传记占了很大的比例，尤其是毛泽东的传记，我是百看不厌。妻子知道后，每和我逛书摊，只要见了与毛泽东有关的书，她就往我手里递。我喜欢朗诵，每次朗诵必是毛泽东诗词。很少听歌的我，见到有关毛泽东颂歌的磁带，我是一定要买下。

2004年8月9日，我再次来到毛主席纪念馆，为他献上了一束花。这已经是我十年间的第七次来看他老人家。

△ 小报纸看大世界

1975年秋，我上小学二年级，并且光荣地加入了红小兵组织，这时我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当时父亲在公社农场当会计，由于从



我们大队到农场的路不好走，乡邮员每次都把农场订的报纸送到我们家，第二天父亲上班再带到单位。当时能看到的报纸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吉林日报》、《红色社员报》，后来又可以看到《法制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多种报刊。有了这样的便利，我得以天天和报纸“亲近”。这也许是我后来之所以一直从事媒体工作、每天的生活中离不开报纸的渊源。

最初看报纸只是为了识字，想从报纸上多认识几个字，以此来炫耀一番。很快，这个目的就达到了。后来，我发现把这些我认识的字连在一起，就描述出了一件事。我又可以把知道的这件事告诉别人，又会得到羡慕和赞赏。知道得越多，自我满足感越强。此后一发不可收拾。报纸一来，我就独揽过来。即使在干活的时候，或做作业的时候，我也会丢掉一切，扑向报纸。为了不影响我干活和写作业，母亲不得不和我抢报纸。我上学的时候，报纸来了，母亲收到后，一定要把它藏起来。我一问，她说今天没来。刚开始我相信了，可连续几天没来，我感到有些蹊跷。后来得知是母亲藏起来了，我从柜角翻出报纸后，与母亲大吵了起来。此事惊动了父亲，经父亲的调和事态平息了，从此我严格恪守诺言：干完活，再看报纸。

因为识字少，加之理解能力差，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，转播时经常出笑话。

有一天，我看见报纸登出一个秃脑袋的人的照片，照片上面的标题是“滕代远同志不幸逝世”。我不知“滕代远”是怎么回事，好在“逝世”我知道是“死了”的意思。看完这则消息，我就开始传播，第一个传播对象是我五哥，我对他说：“‘不幸’逝世了。”“谁逝世了？”“‘不幸’呀！”“什么‘不幸’逝世了，人能叫‘不幸’吗？我才不信呢。”我只好把他拽回家，拿出报纸让他看：“你看，是不是‘不幸’逝世了？”“那哪是‘不幸’呀，那不是‘滕代远’吗？”“‘滕代远’是谁？”“这个我不知道。”“那就不能算你对，走，找四哥去。”我们拿着报纸找到了四哥，四哥笑了笑说：“这个人不是叫‘不幸’，而是叫‘滕代远’，可是一个大



官。”“那干吗写‘不幸逝世’了？”“这是说，这个人逝世了，是一件不幸的事，不幸的事就是不好的事。”“那干吗不写不好的事呢？”“那样不是太麻烦了吗？”“终审”结束，我耷拉个脑袋走了……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乐此不疲地读着报纸上的一行又一行字，感受着报纸带给我的快乐。这种快乐一直延续到今天……

随着知识的增多，理解能力的增强，我越来越感受到文字的魅力，于是我的阅读面不断加宽，家里那几张报纸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“胃口”。

上学时喜欢看小人书，那时的小人书就几分钱一本，同学们把积攒下的零钱买小人书，然后相互间交换着看。我父亲管钱很紧，我没有钱买小人书，只能借同学的看。因为自己拿不出交换的书，时间久了，大家就不愿借给我。后来，我就想尽办法积攒零花钱去买书，以至于攒钱买书成了我的一大癖好。

四十年的人生，我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更不跳舞，也很少看电影、看戏，唯独在书上投入很多。手里稍有余钱，就想逛书店。这么多年来，没有积攒下什么家业，唯有那四个装得满满的书柜，是我最大的财富。漂泊中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有两处我是必须去的，那就是书店和图书馆。到了一个新城市，我最先认识的就是到这两个地方的路线。凡到书店，从没有空手而归的，以至于常常受到妻子的责怪。每听说我要去书店，她就会翻翻我的口袋，看看里面有多少钱。太多了她就会悄悄拿出点，因为她如果不拿，那是剩不下的。就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在曾经没饭吃的日子里，我也坚持将口袋里仅剩下的可以用来买两个馒头的钱，一半换馒头吃一半换书看。

妻子也是一个爱书之人，尽管时有埋怨我买书不加节制，但有时又特别“怂恿”我买书。2001年秋天，适逢长春每年一度的书市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狠狠心带了1200元去逛书市。一圈下来，口袋里的钱又是分文全无。看着眼前堆着的书，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



上书走着回家了，于是叫了辆出租车，在车上给妻子打电话，让她准备好车费在楼下接我。停车后，妻子看到车后座的书堆，忍不住又是一通埋怨，边往楼上搬书边嘟哝：“以后你就吃书吧，甭吃饭！”

时隔两天，三哥从吉林市来长春办事，同我一样嗜书如命的他听说书市上遍地是好书，说什么也要去看看。于是我陪三哥再次去了书市。临走时妻子特别嘱咐我，前天已经买了那么多了，这次去只陪三哥，自己千万别买书了。我连连点头。可是到了书市，转来转去，看到好书就手痒痒，结果三哥只买了两本书，而我这个作陪的又倾尽所有抱着书满载而归。

粗略算一下，这些年买书、报、刊的钱至少花掉了四五万元。遗憾的是70%的书我都只是看看前言、目录和后记，真正通读的很少。我一直期盼着有那么一天，我可以完全置身于世事之外，静心读我喜欢的书。

看书读报的习惯使我受益无穷，从小报纸中看大世界，让我不出门可知天下事；而种种书籍给了我丰富的知识，让我这个初中未毕业的半文盲成长为“有一肚子墨水”的文化人。每次看书时，我喜欢边看边“消化”，将它们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转化成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在工作、生活中注意用上所看到、学到的这些新东西，从而使其在使用过程中被不断巩固，最终积淀于心。这样的读书习惯使我“看”书效益很高，妻子最佩服我的，就是我一天看完一本厚厚的大部头，能将书的内容复述出来，甚至在很久以后做演讲或写文章时，能自如地引用里面的句子。

妻子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读过的书也不少，可是每和我做深入交流，总显得“江郎才尽”，她常常感慨，那么多的书是白读了，怎么看完就忘呢？我理解，她不是没读，而是读了之后没有把书里的东西变成自己的，只读不思考，做不到可入可出。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和一些在校学生交流时，他们大多数是在被动地读书，其心理感受是无奈



的；而我是主动地读，心理感受则是快乐的。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，自然效果迥异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读起中学课本来津津有味，而很多学生拿起课本就想睡觉的原因。

看书读报是我的一大爱好，除此之外就是喜欢到乡间散步。在书的海洋中徜徉累了，到郊外走一走，实为一大享受。有时，凝视着书房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书，我就想，等我老了，生活允许我“退隐江湖”了，我就到乡下依山傍水的地方建一座房子，院子里种满花草，坐在花草间读我喜欢的书，到山间散步呼吸山林里清新甜润的空气，那该是神仙也羡慕的日子……

△ 父亲的棍棒教育

虽说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但我想为了表现一个真实的东子，还是有必要把我的家丑往外扬一扬。

父亲兄弟姐妹七个，父亲是挨打最多的一个，因为父亲是他们七个中最不听话的。我们七兄弟中我也是最不听话的一个，自然挨打最多的就是我了。用父母的话说，我小时候就不是“东西”，在家不听父母的话，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。事实上我确实是这样，因为我叛逆、我不乖。我认为不管是谁，错的就是错的，无论父母还是老师，你错了就应该承认，而我没错干吗让我承认错误呢？！所以很多时候我因为挑老师和父母的错，而被斥为难管的孩子；因为不服他们的批评，死不认错，而被父母打骂，称为“犟种”。

在中国，师长为了维护师道尊严和父道尊严，很多时候是全然不顾是非。也就是说，父母说的和老师讲的全是对的。你指出他们的不足，就是大逆不道。所以，千百年来，中国人在师长面前习惯了逆来顺受、听任摆布。为了与此抗争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。这种痛苦既有身体上的，也有心理上的。

父亲秉承棍棒之下出孝子。所以他们唯一的教育手段就是“打”。当然，打之前一般要骂一通，就像下雨前要打雷和刮风一样。



小错(他们认定的错)骂是前奏,骂几句,如果我们的态度良好,也就免了皮肉之苦。大错(依然是他们认定的)则是风雨交加,连打带骂。如遇大错,谁都逃不过去;遇小错,除我之外,其他兄弟都逃得过去。

我不知道别人的童年是怎么过的,我的童年和少年是被打着过来的,用二哥的话说:“东子是在战斗中成长的。”换句话说,我是在别人的皮鞭、拳头下长大的。打我的人当中,有父母,有哥哥,有比我大的伙伴和村中的成年人,有比我大的同学,还有我的老师。打我次数最多的当属父亲和四哥、五哥。我实在记不清在我逃离家之前,我究竟挨过多少次打。我只知道,上一次的伤疤尚未痊愈,新的伤疤又添。我总是被打得两眼肿胀满脸青紫。我曾经怀着对打我的人的仇恨,想过到少林寺学武术,目的非常明确,学好武功,惩治五哥等长期欺压我的那些人。

我11岁那年冬天,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,父亲领着我和几个哥哥到离家20多里的雷劈山脚下搂柴火。由于我不想去,所以到那里,父亲给我棉手焐子(棉手套),我不戴,非要光着手干活。父亲见我与他有意作对,一顿拳脚,将我打得满身开花。像这样的暴打,记忆中每年都有。我一直不否认,父母和众兄弟打我,原因在我的时候多。如果我不抗争,不犟嘴,乖一点,何至于此呢?父亲和众兄弟打我倒好理解,因为,他们的脾气都不好。可一向善良慈爱的母亲也一次次暴打我,就很难让人理解了。因为打我,母亲打碎了好几个笤帚疙瘩。

最近十年,我一直在思索:如果我不这样,会挨这么多打吗?不会。如果我不遇到这样的家庭,会挨这么多打吗?也不会。如此说来,家庭是有一定关系的。自从事心理研究工作后,我更多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的家庭以及我的童年。父亲年少时,是在棍棒教育下长大的,所以,他也尊奉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的教育理念,要用棍棒教育自己的孩子。父亲打的第一个孩子自然是大哥,在父亲的“言传身教”下,以及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,被打的大哥就会打二哥,二哥



又打以下的兄弟……在我们家中，哥哥打弟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唯一能够打的是弟弟，而弟弟又把手伸向侄儿。

其实，在这个家里，父亲所打的第一个对象不是大哥，而是母亲。母亲与父亲生活的50多年里，没少遭父亲打。经常遭父亲责打的母亲，心里充满了怨气，有时难免因为无处发泄而拿我们出气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母亲如此善良，但打起我们来却那么狠的原因吧。而我偏偏是那种总往“枪口”上撞的孩子，经常在母亲怨气积蓄需要发泄的时候，惹下一些祸端，结果招致母亲的恶揍。

可以说，我们这个家庭到处充满了暴力，上从父亲下到我们哥儿七个，个个崇尚暴力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最有权威。遭受暴力和反抗暴力一直贯穿着我们这个家。有时，我想若是我有几个姐姐或妹妹，也许这种暴力的氛围会削弱很多。可惜，母亲盼了一辈子女儿，也没见着女儿的影子，我也就注定没有姐妹。在父亲和哥哥冷酷的棍棒和拳头的击打中，我也不无例外地好斗和崇尚武力。

尽管如此，我深知父母是爱我的，世上最牵挂我的人永远是生我养我的父母；兄弟们是爱我的，我们有着一般兄弟所不具备的手足情。这一切，从今天我与父母和兄弟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，我从不抱怨我的父母和兄弟，从不抱怨生在这样一个家庭。尽管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给我细腻的关爱和呵护，但是正是他们的棍棒成就了我从不向任何强势屈服，不向任何艰险苦难低头的性格，成就了我这不同常人的人生！没有他们的责打，我可能走不出那片狭小的天地，也许今天我还在田头摆弄镰刀锄头，怎会有后来的一切？

多年来，我经常听一些青少年说“父母从来没对我动过一手指头”，也不时听一些中青年父母感慨“我们从来没动过孩子一手指头。”年少时，我非常羡慕这些从来没被父母打过的孩子和从没打过孩子的父母。传统的棍棒教育是失败的，可我们不能从一个误区，再走向另一个误区。我不希望现在和以后的孩子再有我那样的童年，但我也希望有被父母溺爱的童年，棍棒教育不可取，溺爱更不可



取。因为溺爱教育出来的孩子中很少有孝子。

当我当了爸爸,我发誓决不让女儿“享受”我那样的童年,但也不会出于补偿心理,走今天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之路。

△ 三次出逃

在乡人“赐给”我的众多外号中,尤以以地名命名的叫得最响的是“范吉林”、“范双鸭山”、“范大连”。这三个绰号后面是三个心酸的故事。

1978年12月上旬的一天,生产队分苞米瓢子,我奉命到场院领取。我当时是挑着一副箩筐前去,在去的路上,遇到同向行驶的生产队马车。一向好偷懒的我,顺势将扁担和筐放到车上,自己也美滋滋地坐在车上。车在行进一个胡同时,将我的一个筐挤碎了。当时就把我吓傻了,这下完了,回去怎么向父亲交代?想来想去,没办法我只好先到老婶那里借一个筐。此后几天无事,我以为万事大吉了。

一个星期后的一天,由于我超额完成了学校布置的拾粪任务,而被评上劳动模范。放学后,我拿着奖状,乐颠颠地跑回家。“筐呢?”刚进家门,还未站稳,就听到父亲打雷般的怒喝。“筐、筐……”我的高兴劲儿一下子全吓没了,不知所措,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“我问你呢?”原来今天老叔家用筐,老婶来取前几天我借的筐。一听说来取筐,父亲一脸的茫然:“什么时候借你们家筐了?”“前几天,小东子借的,去场院挑苞米瓢子。”面对事实,我也只好如实交代借筐的过程,然后等待“享受”皮肉之苦。然而父亲却破天荒没有打我,但把我痛骂了一顿:“你这个败家子,干啥啥不行,生你这样的孽子有什么用?!你给我滚,滚得远远的……”

三天后,我真的“滚”了……

我先是步行20多里来到新安公社的表姨家。表姨全家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谎称要到吉林看三哥(当时他在吉林市当兵),表姨只



是问了一句：“你这么小，能找到吗？你妈放心吗？”“没事，大姨，我能找到，您放心吧。”第二天，我随着表姨他们生产队上三岔河（县城）赶集的大马车，天没亮就出发了。到县城后，由于没钱买票，我就在火车站周边乱转，看从哪儿能进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转了一上午，终于找到了进站的通道，下午我登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。

到长春下车后，在通过地下通道出站时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三转两转，我又回到了站台上。索性我就不出去了，等去吉林的车来了，直接上去。渐渐的天黑了，我有一些恐惧，不停地穿梭在各个站台之间，终于摸上了车，向吉林市进发了。

到吉林下车后，我向一位民警打听去江北消防四中队怎么走，他把我送上一辆汽车说：“快上车，就这一趟车了。”在车上我不停地问，江北四中队在哪儿下车，很多人都不停地告诉我。可我耐不住性子，加之怕坐过站，所以稀里糊涂地就下了车（提前两站）。下车后，我向一对青年夫妻打听路，他们让我到前面的派出所打听一下。我按他们指的方向，向派出所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想：这派出所是干什么的呢？拖着又累又饿的身子，终于走到了派出所，借着灯光我看到门前竖着一块牌子：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龙潭派出所，再看看屋里走动的都是穿民警制服的人，我激动地敲开门，扑进一个高个子民警怀里：“警察叔叔，帮我找找哥哥吧！”几个民警过来，一边为我暖手，一边问我是怎么回事。一个民警拨通了消防四中队的电话：“你们中队有叫范井才的吗？”“我就是呀，什么事呀？”听到电话里传来三哥的声音，我特别激动。那个民警问三哥：“你有个弟弟叫范井宇吗？”“有啊。”“他现在在我们派出所呢，你来接一下吧。”

大约 10 分钟左右，一辆红色吉普车停在了龙潭派出所门前，三哥和他的一个战友来接我了。接到消防队后，三哥给我打了一盆热水，让我好好洗一洗，我一照镜子才发现，自己比从非洲难民营逃出来的孩子还脏。过了一会儿，三哥端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：“饿了吧，赶紧趁热吃。”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